

# 何玉成和他的《揽翠山房诗草》

黄 国 声

震惊中外的一八四一年三元里抗英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性斗争。这次斗争领导人之一的何玉成，是番禺县萧冈乡人。《番禺县志》没有为他立传，同时代人对他也记述无多，遂使其人其事，幽昧不彰。而他唯一的著作《揽翠山房诗草》，传本极少，遭世多故，濒于绝迹。近人撰作何玉成传记，钩稽典籍，颇有创获，何氏生平，乃得概见。所憾者是他们未见《揽翠山房诗草》这一重要文献，因而对何氏一生行止及思想，无从作更深的了解，疏阙自然难免。笔者有幸读到沧桑子遗之《揽翠山房诗草》，爰据以考述何氏生平，仅撰此文，以作治近代文史者的参考。

## 《揽翠山房诗草》的下落

要了解何玉成的生平，《揽翠山房诗草》（以下简称《诗草》）是十分重要的资料。因此，便从它的下落谈起。

早在一九五三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成立近代革命史研究会，该会属下的三元里抗英史料研究组曾到三元里一带作过广泛的调查，收集抗英斗争史实，并特意访查了何玉成的事迹及其《诗草》。他们此行虽采得何氏遗事的一鳞半爪，但《诗草》却

始终没有见到，仅从该村老塾师何凤俦处抄得玉成遗诗三十九首。以后该组又函询四川省射洪县政府，从《射洪县志》中录得何玉成诗八首，合共四十七首。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遂据以辑印为《揽翠山房诗辑》（油印本）面世。何氏著作缘此得与世人见面，诚属可喜。现在时隔三十载，即此油印之本也成了稀见之书了。

《诗草》的踪迹如何，人们的看法是颇不一致的。一九五六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张友仁先生撰《何玉成传》说：“玉成自刻诗稿，用所居揽翠山房为名，久佚。”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华书局再版该馆所编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其中的《何玉成传略》仍沿用张说。三流先生的《从晚清诗歌中看三元里人民的反英斗争》（收入《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诗歌卷》中）则认为：“（诗集）未刻行，抄本已佚。”齐思和先生的《鸦片战争书目解题》收录宏富，却未录《诗草》一书。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则连《诗草》中一首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诗歌——《团练乡勇住扎四方炮台等处记事》也没有收入。可知前二者实未尝见过刻本，其结论不过是悬揣之辞；后二者则恐怕不知道何玉成有此诗集。其实，《诗草》曾刊刻过两次。它初刻于咸丰二年，那时何玉成还在射洪县任上，是由该县训导熊绍伊等人负责刻印的。这个刻本流传极少。过去，留意收藏广东地方文献并富有藏本的藏书家徐信符教授也说：初刻本难得，求之多年，终无所获。徐氏弟子何文广先生铭记师言，多年后，无意中得遇初刻本一部，购存书室，矜为善本。不料文革多故，此书竟被白蚁蛀毁，从此初刻本遂绝迹人间。重刊本是咸丰八年亦即何玉成休官回粤的次年刊印的，这个本子据笔者所知，仅广东尚存一部，此外盖无闻焉。

现存的重刊本《诗草》，是按体分编为六部分的，每部分之首冠以诗体名称而未标示卷数，计收诗二百四十一首，另附试帖诗二首。持与油印本《诗辑》比较，优劣判然：（一）重刊本收

诗数量多，为油印本之六倍。（二）重刊本有熊绍伊序及杨涛跋，为油印本所无。（三）油印本所收诗因出自后人抄录，往往有删节诗题，脱漏自注，作品次序颠倒，字句改易谬误等严重毛病。如果以初、重刻本比较，则初刻虽属难得，但收诗仅至咸丰二年（据熊序杨跋），重刊本则收诗至咸丰七年，从数量上说自然较胜。又重刊本书名页标明“板存本宅”，但玉成后人式微，当亦无力再行印刷了。

### 从《诗草》考见的何玉成生平

考述一个人的生平，生卒年是个关键，但何玉成的生卒年却是个谜。后人撰写何氏传记时，由于资料缺乏，都没能解决这一问题。现在得见《诗草》，谜底可望揭开了。先说生年（卒年容下文再谈）。查《诗草》有《观扞涨》诗，题下自注云：“甲午年五月，时馆江村。”有句云：“余年未五旬，水灾经目睹”。甲午为道光十四年（1834），诗称“年未五旬”，则有渐近五十之意，起码已超过四十五岁才能这样说。今定玉成是年为四十六岁，以此上推当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这个推断虽未必十分准确，相去亦必不远。因另一首纪述年齿的诗是《癸丑解饷赴桂林差竣腊月二十日寓中邀谭荔仙周鹤仙小酌自寿》，有句云：“六旬齿长轮蹄马”，癸丑为咸丰三年（1853），按上述生年计算，此时为六十五岁，与诗意正合。至于玉成的生日也是可考的，同上诗有自注云：“余贱辰后东坡先生一日”，则其生日为阴历十二月二十日。

何玉成的少年时代是怎么度过的，已无法确切知道，但从《诗草》中可以看到他是出自农家，境况清贫，过着耕读生活的。《田家杂兴四首》云：“结屋云山下，田畴少膏腴……时方播早谷，杂艺瓜与蔬。屈指届瓜期，家计可稍舒。”自道其早年的生

活境况。

嘉庆二十二年（1817），何玉成中了秀才，时年约二十九岁。此后便以教书为业。但塾师生涯也是清苦的，他曾慨叹说：

“株守经年数米餐，方嗟挟瑟向齐弹”（《次韵答招香浦先生见寄》）。道光十一年（1831），玉成得中举人。次年赴北京应进士试，不第南归（《壬辰下第出都留别诸友》）。十四年，在家乡附近的江村教书（《观杆涨》）。十五年，再度到北京应试，仍不第（《乙未下第南旋余杭舟次忆壬辰岁黄星洲梁虹川旧游有作》）。归里后，翌年受聘到新会县塾馆教书，其时适逢玉成中举人时的分校考官林星章新任新会县令，玉成作《呈房师林古畚先生时新任新会令》，诗中有云：“惆怅年来白发侵，征途三度马骯骯。”盖为两度晋京终无所获，归来后又为任教奔走而叹息。道光十七年，曾转往某县任教，《丁酉岁馆新即事》有句云：“扁舟一叶下东南，观海探奇气不凡……隔溪潮涨鱼虾集，满案花飞燕雀衔。”则其地当为广州东南方濒海之东莞或宝安县。

大约两年后，玉成以微薄的积蓄勉力营建了小小的揽翠山房。《揽翠山房即事》云：“结屋面云山，云横苍翠间”，“半百年过矣，搔头白发侵”，“小筑名藏芥，经营力已殚”，可见时间约在五十一岁那年（道光十九年），地点是广州白云山下他的家乡萧冈村。由于财力薄弱，营建是费尽他的心力的。

塾师的生涯飘泊无定，道光二十年春初，玉成受聘到英德县任教，但到十月就辞馆回乡了。其时有《九日南山登高》、《十月卷帐回里和杨仰山春初送行原韵》等诗记其行止。英德南归之后，由于林则徐的严厉查办鸦片，战争迫近了。道光二十一年阴历四月初四、五日，英国侵略军在广州泥城登陆，进袭城北四方炮台。乡居的何玉成“即束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梁廷枏《夷氛闻记》）。一时丁壮云集，慷慨同仇。初十日，侵略军进扰三元里等乡，三元里人民高举义

旗，奋起还击，与附近各社学乡勇包围英军。值大雨，英军火药尽湿，枪械不能燃放，而乡民不约而来者万名，英军不敢接战，即于十二日早上仓皇下船逃去。玉成实参与斯役。五月，清政府札调何玉成率怀清社学团练一千名进驻城北各炮台，防堵侵略军。至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事稍定，始散团。是年十一月，广州群众激于义愤，火烧英国商馆。清政府惧事端扩大，札令何玉成带团练一千人进驻小北校场，以防不测。十日后，事稍定，遂散团归。《诗草》有《团练乡勇住扎四方炮台等处纪事》诗五首，以身历亲闻详记这些事件的经过，史料价值极高。诗中充满对英国侵略者的仇恨，对人民抗敌精神的讴歌，也展现了何玉成强烈的爱国热情。

三元里抗英之战后，玉成行止不详。道光二十四年，他第三次赴京应进士试，依然名落孙山。按清代成例，举人应考三科不中者，可于会试后参加大挑。玉成大挑一等，以知县分发四川任用。同时参加大挑获二等者尚有粤人崔群、梁澄心、何允成等（《南旋舟次余杭席中听歌和崔睦堂原韵与梁泰园家功甫同作》）。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玉成从广州出发去四川，一路上度南岭，过湘江，入贵州，经重庆，历尽长途跋涉到达四川省会成都，其时可能已近岁末了（《入蜀纪行》）。此后可能是在省城候补，或担任些临时差委的工作。到道光二十八年，才被任为射洪县知县。从此一连三任，咸丰六年始行解任，东归故乡。据《射洪县志》记载，他在任内，于太和镇建广寒书院，于县署内建眠琴书屋，聚邑中俊秀诵读其中。此外并多善政。他对射洪先贤如陈子昂、杨最以及曾寓居此邑的名人，深致仰慕，形诸吟咏，集中《金华书院合祀陈伯玉子昂杨殿之最两先生诗以纪之》、《陆使君祠》、《郭代公故宅》、《杜少陵流寓》等，均为此时所作。

在射洪任内，咸丰三年他曾奉命沿长江东下，跋涉长途，解饷至桂林。其时虽已六十多岁高龄，仍然“长途千里志犹雄，萍

梗姻缘笑此翁”（《癸丑解饷赴桂林差竣腊月二十日寓中邀谭荔仙周鹤仙小酌自寿》），表现了积极用世之心。咸丰七年，适逢地方官大计（考绩）之年，他可能被上官考定为政绩不佳因而按例休官。不过，这只是事情的表面现象，因为玉成休官后，作《留别射洪绅民》诗，其中却透露了一些消息，如“解饷当年赴桂林，旋因捕盗罢鸣琴”，“事虽周折仍存直，心为慈祥每过宽。未解逢迎车就熟，固应飘堕柳惊寒”。可见他为人耿直，为政务宽容，可能在捕盗问题上亦持此宗旨，加以不肯逢迎取悦，不免得罪上官而致落职了。

仕途的挫折，不公平的待遇，对于玉成是个不小的打击，然而他却豁达处之，“莫嗟零落甚，生意待阳和”（《落叶》）。他设想回到故乡后，“耕樵往迹寻犹在，文酒雄心老未灰”。不久，他就回到故乡萧冈村居住。《诗草》收诗仅至咸丰七年射洪县任内止，所以他乡居的行止就不能详悉了。但他仍以维持桑梓治安为己任。同治三年（1864）玉成重修怀清社学，并改名为佛岭社学（《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足见他晚年为人处事，仍然保持着敬慎桑梓，宽容为怀的作风。

玉成的卒年无可考。后人作传，于此亦付阙如。但据萧冈乡老人汤成安回忆说：“我年轻时曾见过他（何玉成）”（《羊城晚报》1961年5月27日《我见过何玉成……》一文）。汤成安是时为八十九岁，上推当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则其到懂事获见何玉成时，已是光绪初年。时玉成尚健在，寿当至九十以上，惜乎载籍不详，无可确考了。玉成有子名瀚之，见《番禺县续志·科目表》，又有子名景崇，见《诗草》，后亦无闻，盖已式微了。

### 从《诗草》看何玉成的思想

玉成起自田间，饱历饥寒，曾亲自参加过耕作，《田园杂兴》

中透露了他早年的生活苦况。后来虽中了秀才、举人，却一直是以教学为生，过的是出外就馆、收入低微的生活。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的下层，和劳动人民接触的机会较多，思想上和他们也容易接近。他的《癸酉岁大水叹》、《癸巳岁水涨和杰仁弟原韵》等诗，都表达同情受灾农民的感情。后来，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益加深，军事入侵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久处下层的何玉成对鸦片给人民带来的毒害和经济侵略所造成的危局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为此担忧和愤慨。当林则徐奉旨南来查办鸦片之际，他正在广州北面的英州教书，闻讯之下，尽管他只是一个塾师，却不由得为之鼓舞和深寄期望。此时所作的《九日南山登高》云：“使节南来积弊搜，鱼龙横海倏惊秋。连船莫便矜猿臂，巨镇终难越虎头。顾影每惭潘岳鬓，抚怀偏感杜陵愁。何时扫却氛埃去，浩荡晴波狎海鸥。”爱国主义的炽烈感情，喷薄而出，这正是他后来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的先声。前些年史学界曾有人认为何玉成是地主阶级人物，不可能成为斗争的领导人，

《诗草》中许多充满爱国热情和抗击侵略决心的诗篇，恰恰给他们作了正面的回答。同治十三年重修的《颜氏家谱》中颜金铸传云：“道光二十一年，会同番禺举人何玉成督卒乡团，于四月初十、十一连日进剿，力解城围。”是个有力的证据。

生活在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有入仕经世的愿望，玉成自亦不能例外。他中了举人之后，三次赴京应进士试，都未考中，只得援例大挑，获选为射洪知县。在任的治绩，体现了他青年时期就已形成的经世济民思想。他早年曾认为上古人民淳朴，治政可以较宽，但“世会日以降，机械日以生”，古代用蒲鞭示辱、画地为牢的方法，已不适用。他主张“宽由猛以济，德与威相成”（《述古》）。因此，他在任上执法严明之外，还十分注意宽松爱民，“十载通泉愧宰官，公余常作我生观。事虽周折仍存直，心为慈祥每过宽”，并谆谆致嘱人们要“慎勿逝梁兼发笥，

“最宜涂墍与编茨”（《罢官旋里留别射洪绅民》）。回归乡里后，他又曾庇护过红巾军起义失败的余部，都足以见出他同情劳动人民的仁爱胸怀。

玉成的为人是洁身自爱，慎于交游的。他认为“结交古笑黄金俗，结交古鄙豪门辱”（《结交行》），倾慕海瑞的“刚自平生志，清如彻底看”（《读海忠介传》）。三元里抗英斗争之后，他名动一时，却并不夤缘结交官府要员，以图进身之阶。相反，他交往的仍是诗朋酒友、山野之士。为的是自己“傲僻原成性，疏狂任率真”（《留别梁啸谷》）。即使后来做了县官，也只与僚属唱酬，不去攀附上级的。他的被罢职，也是因为不肯逢迎的结果。

作者工作单位：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

##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 释录》影印出版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系从中、英、法和俄、日等国所藏文书中辑录而成，分类影印，并附对照录文，分四册出版。已出版的第一册内容包括地志和瓜沙两州大事记及巡行记；姓望氏族谱、各族志、家传；籍帐、手实、差科簿；社约、投社退社状、社司牒社和转帖、纳赠历、收支帐、社斋文等社邑文书；敦煌县行用水细则和渠人转帖；行人转帖、沙州会计历、河西和耀会计牒、军仓、郡仓收纳麦粟谷等历、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谷计会等财政文书……，凡五百页。它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珍贵资料，其中有的资料是第一次发表。出版如此庞大的真迹并带释文的敦煌文献，在国内乃是首次。

• 兆 坚 •